

中国高级记者丛书

当半月谈“老总”的岁月

于有海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半月谈“老总”的岁月/于有海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5

ISBN 7-5011-4067-7

I. 当… II. 于…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4616 号

当半月谈“老总”的岁月

于有海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7.25 印张 43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河北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067-7/G·1497 定价: 34.00 元

目 录

岗位自述篇

- 办刊物，我新的岗位····· (3)
- 在政治风波里站稳脚跟····· (10)
- 受命于危难之际····· (18)
- 两副对联的酝酿和实践····· (24)
- 到邯钢采访····· (31)
- 我们的“大编辑部”····· (38)
- 我讲《在世界看中国》····· (44)
- 广告——广阔的经营天地····· (50)
- 在以色列做客····· (56)
- “扶贫状元”响了····· (62)
- 在荣誉和压力面前····· (68)
- 划了句号，还有删节号····· (76)

采写编辑篇

- 从什么都怕说到什么都敢说····· (87)
- 改革带来的和并非改革带来的····· (92)
- “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之我见····· (98)
- “官念”在广东····· (104)

假如迟迟不自愿·····	(109)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搞不搞了? ·····	(112)
安定方能兴邦·····	(114)
改革开放十四个不变·····	(118)
稳定不是不动·····	(120)
抓住历史机遇 促进经济振兴·····	(124)
假如多生两亿人·····	(131)
分明增加了,何以减少了? ·····	(135)
“饭碗”之战 ·····	(140)
苦干胜过苦熬·····	(145)
“三铁”,不能一“砸”了之·····	(149)
换个角度看问题·····	(152)
不该有的“失落感”·····	(154)
关键是发展经济·····	(157)
东渡扶桑的思索·····	(162)
切勿亵渎“真抓实干”·····	(167)
改革开放与人民内部矛盾·····	(169)
一十五年改革 二十七步跨越·····	(176)
虾和苹果的思索·····	(180)
警惕新的浮夸风·····	(183)
国企,统计数字的前与后·····	(186)
“扶贫状元”诞生记 ·····	(191)
精神也是一种资源·····	(195)
贫困同胞,祖国在关注你们! ·····	(200)
但求普天下共同富裕·····	(204)
就本刊明年调价致读者·····	(209)
广州,不光抓票子·····	(212)
邯钢,看似不能却有为·····	(216)

不妨换个活法·····	(228)
国内的“和尚”也会“念经”·····	(233)
上海，下岗百万和快速发展·····	(237)
沈铁领导的“衣食父母观”·····	(241)
“红旗”在跟“奥迪”较劲·····	(246)

时事评论篇

既要管住 又要放活·····	(253)
知难方能稳步向前·····	(255)
我们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258)
清腐兴廉 振奋民心·····	(261)
改革须有主心骨·····	(264)
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267)
统一思想认识 推进改革开放·····	(269)
让“第一”真正当第一·····	(272)
思想再解放些·····	(274)
我们需要风险意识·····	(277)
热在当热处·····	(280)
抓机遇要讲科学·····	(282)
搏击市场风浪前行·····	(285)
党和政府惦记着我们·····	(288)
稳定，是为了改革和发展·····	(291)
“为人民服务”万岁·····	(294)
市场经济≠自由经济·····	(297)
想起了“年年难过年年过”·····	(301)
跨向新世纪·····	(304)
讲政治与搞经济·····	(307)
送温暖和反腐败·····	(310)

想好事和办好事·····	(313)
在“同时”上面做文章·····	(316)
沉舟侧畔千帆过·····	(319)
放心走吧，小平同志！·····	(323)

形势分析篇

思考过去 展望未来·····	(329)
实现小康：中国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	(349)
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371)
说说五个“为什么”·····	(392)
站在世界看中国·····	(424)
我们正告别短缺经济·····	(455)

业务研讨篇

谈在众人疑惑时·····	(481)
市场经济与《半月谈》的变与不变·····	(491)
多出老百姓需要的精神食粮·····	(498)
半月谈十五年·····	(501)
《半月谈》和时政期刊·····	(514)

岗位自述篇

办刊物，我新的岗位

1988年6月，我从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编辑室主任的位置上被调到了新的岗位——半月谈杂志社任副总编辑。半月谈虽说也是新华社的一个下属单位，但到这里与在国内部时不同，要开始办刊物了。

在此之前，半月谈当时的总编辑闵凡路为这事征求我的意见，我几乎未加犹豫便应承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在国内部呆腻了，也并非出于升迁的考虑。

在国内部工作期间，我的业绩还算可以。我搞过体育、文艺、政治报道，较长时间是从事工业、财贸的采编业务。我有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四川省武斗调查和粉碎“四人帮”后受命赴上海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经历，担当过采写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全国党代会、人代会的重任，组织过集中力量进重点工程建设和步鑫生、马胜利、李双良等典型人物的连续报道，并且在国内部老主任冯健、李峰等同志的鼓励、帮助下用自己的笔率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的传统。对我取得的一点成绩，新华社和以穆青老社长的名义发过嘉奖令，1984年还把我评为全国的优秀新闻工作者，1996年又被评聘为全国首批高级记者，我该知足了，呆腻之说无从谈起。

至于升迁，更说不上。半月谈原是新华社国内部下属的一个处级单位，分出去独立以后，除了离开国内部主任岗位担任编委

会主任的李峰仍保留正局级待遇、闵凡路同志特批为副局级总编辑以外，也还是一个处级部门。我调任半月谈副总编辑，仍旧像在国内那样为处级干部（工资还是按高级记者的标准拿），丝毫未“升”，当然成不了吸引我到半月谈来的理由。

半月谈吸引我的，是它神速般的崛起。《半月谈》刚创办时，只有几个人，发行量很小，没有多少人看得上它。我很早就受托给《半月谈》写稿，后来成了它的特约记者，在不断的接触中眼见它年年壮大，发行量之大和社会影响之大都令人敬慕。到这样的杂志社工作，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因此当穆青同志最后拍板定下，我便很快走马上任了。

刚到半月谈的时候，李峰与闵凡路说了一些欢迎的话以后，即给我布置工作，要我分管业务——负责抓《半月谈》杂志，讲这是半月谈杂志社的主要版本，责任重大，相信我可以搞好，云云。

1988年是改革开放10周年，我遇到的第一个大课题就是组织有关编辑展示那不寻常的10周年。要是还在新华社国内部，这不成问题，类似的报道经手不少，搞起来难度不大，可是在半月谈的岗位上情况变了。

按照在新华社国内部向全国发通稿的思路，我设想了一批题目，其中多数是直接写成就的。对这些，半月谈的老同志听了有的赞同，有的不大满意，理由是如此经营的稿件，跟老百姓疑虑的事情扣得不紧，缺乏说服力。正当我为难的时候，李峰出了一个主意。他说，现在基层的干部、群众对改革议论很多，牵涉的问题有的确实是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也有些早就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要是能有联系实际的分析性的文章，虚实结合，说理透彻，就好了。李峰边说边思考，当场讲了一个题目：《改革带来的和并非改革带来的》。他解释，这样的题目显得长，也怪了些，但吸引人，写好了读者愿意看。欧阳晓晴、孙伶两位编辑领了这

个题目，要我协助他们完成。

那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间，改革开放的浪潮此起彼伏，国民经济的发展史无前例，人民生活的水平迅速提高，可也有一些问题困扰着人们，物价上涨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增长7.3%，仅次于1951年的12.7%、1961年的16.2%和1985年的8.8%，1988年涨势更猛（到年底统计达18.5%的创历史最高纪录的水平），公众因此议论纷纷，以至于产生了“改革就是涨价”的说法。生活好了，价格高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老百姓的感受一样，关键是如何去看。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价格与价值背离，大家都习惯于“物价稳定”，也看到这种稳定挫伤了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买东西要凭票、排长队的一面。对物价做必要的调整，商品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了，但市场东西多，好买了，是不容否认的大好事。问题在于，那时候存在着计划内和计划外“双轨制”，有些人以权谋私，钻空子倒买倒卖，从中渔利，还有的搭车涨价，哄抬价格，引起了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者的不满。此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贪污受贿、偷盗抢劫、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泛起也让大家忧心忡忡。凡此种种，读者非常关心，我们必须正视，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促使人们对改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弄明白事情的主次，也就是哪些是改革带来的，哪些并非改革带来的。

两位作者和我把读者的疑惑放在心上，走访了有关方面，翻阅了若干材料，几经研究，三易其稿，将《改革带来的和并非改革带来的》弄出来了。

稿子开头是这样切入的：

十，对中国人来讲，是个吉祥喜庆的数字，逢十大庆，这是传统。然而，这一次似乎要例外了。

今日中国，无论城市、农村、机关、学校都不乏抱怨之声：

“涨，涨价，涨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

“以权谋私，以职业谋私，没有后门就办不成事情!”

“操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抱怨之中自然也夹杂着骂娘声。

怨，是因为己不如人。

骂，是因为改革不尽如人意。

人们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样提出的问题是读者关心的，背景的交待也是读者所熟悉的，易于接受，重要的是对人们疑虑的事情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平等对话，因势利导。稿件为此抓住物价这个焦点摆事实，讲道理，人情入理，循循善诱：

七十年代以来，当中国从噩梦中醒来，突然发现，疾驰的世界经济列车已经远去了，我们被远远抛到了后面，许多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高于我们。

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正视了自己多次坐失良机而落伍的痛苦现实，终于找到了使民族振兴的助推器——改革。

这是在痛切地感受到统制经济和集权政治给中国设置的巨大桎梏之后，做出的唯一选择。

历史的教训要求我们遵循价值规律，据此对物价进行或升或降的调整。由于关系我们全局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价格长期偏低，物价上涨成了人们主观愿望不可转

移的总的趋势。

换句话说，不涨价就能把价格理顺是不可能的。

按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商品都推向市场，让市场来决定商品价值，然而，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承受力，不可能这样一步到位。于是，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度的“双轨制”，即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行的体制诞生了。

但这样一来，两种价格的差价带来了漏洞，使得有些人可以从中牟取暴利，“私倒”、“官倒”之类相继冒出，商品不出库，提货单大旅行，层层加码，乱涨价者大获其利。

不难看出，无论是合理的涨价还是不合理的涨价，都是我们价格改革中伴生的现象，然而它绝不是我们价格改革的最终目的。

物价上涨与其说是改革带来的结果，不如说是改革引起的矛盾和冲突。

其实，改革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还远远不止这一个。

讲过这个重点问题以后，稿件对人们议论的其他主要问题分别加以叙述，说明改革从整体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出现的某些问题导因于改革缺乏经验，有一部分则历来存在，不过是在大河东流、泥沙俱下中泛起的沉渣而已，并非改革带来的。

《改革带来的和并非改革带来的》发表于1988年8月10日出版的第15期《半月谈》上，它成了当年特别开设的“十年改革的沉思”专栏的开篇之作。此文以敢于、善于抓热点和情理兼顾、高瞻远瞩、富有说服力而受到广泛好评，被新华社评为社级好稿。这个栏目里持续到年底的其他一篇篇文章，也都受到了读

者的欢迎。我作为经营“十年改革的沉思”专栏的参与者之一，对它们的诞生费尽了心机，却又是一个直接办刊物的人初学、实习的过程。

1965年我告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的工作，来到新华社国内部，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连续干了22年。这22年间，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北京房山“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一直在采访啊，写稿啊，80年代中期当起了编辑，大部分精力用于稿件的策划、组织、经营、编发和评论的撰写上。本人1948年入伍前只上到小学五年级，经过一年半残废军人速成中学的补习，1956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底子很薄，水平有限，值得欣慰的是比较刻苦，舍得花笨工夫，在新闻业务中上路还算快。加上为《半月谈》写过了一些稿子，当过它的特约记者，办杂志原想可以应付，没料到并非那么回事。

到了半月谈任职，才懂得办刊物，尤其是办《半月谈》这样的刊物不易。《半月谈》和它的系列刊物文字简短，通俗易懂，似乎好办，其实不然。

如果说经营《改革带来的和并非改革带来的》这样的稿件难度很大，那么搞半月谈其他的一些稿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例如刊物上通报领导同志指示的吹风和有关形势变化的大事记、黑板报等，完全是资料性的，但是干部、群众需要。它们有的成为人们学习的内容，有的被当作考学、考干的参考材料，有的是基层抄黑板报的范本。对如此有价值的事情，我跟初到半月谈的同志一样起先眼高手低，觉得不必花多少工夫，直至亲身干了以后才懂得不那么容易搞。它需要你统览国内外大事和党与国家的方针政策，能抓住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东西又应当是读者非常关心、急于了解的，没有广阔视野和熟悉群众心理的本领，是很难搞得好的。

创刊于1980年5月的《半月谈》，发行量从开初的29万份猛增到1985年的500万份以上，此后一直高居全国各报刊的第一位，构成了同行们所称道的“半月谈现象”，原因何在呢？阎凡路在会上、会下讲过不少，诸如《半月谈》以时事政策为主、基层读者为主、正面宣传为主和要成为“时事政策顾问 学习生活益友”，《半月谈内部版》致力于内部探讨和要成为“干部之友”，使我收益匪浅。不过从后来接触的情况看，要真正认识半月谈，让自己适应它的工作，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

在政治风波里站稳脚跟

办刊物和游水一样，通常情况下显不出什么，本领高低只有在大风大浪里才能见分晓。我到半月谈任职后的1989年，刚好遇上了那场罕见的政治风波，有机会亲身经历了杂志社的老同志处险不惊、站稳脚跟的全过程。

1989年年初，社会上就出现了某些风雨欲来的势头。突出的表现之一，是有几个人纠集在北京一个叫“捷捷酒吧”的房子里，向西方记者宣读一封支持名为要求民主、实则鼓吹动乱的魏京生等人的信，扬言征集签名，并妄图与一外国驻京大使馆串联，以扩大他们的所谓影响。对此，党和政府十分关注，半月谈非常敏感，闵凡路亲自采访，很快采写了一篇极有份量的题为《发生在北京的一场风波》的文章，以翔实材料加以揭露和抨击。

如果说这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到4月中旬以后事态逐步升级，情况就变得相当复杂了。新闻宣传单位历来注意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按中央的指示组织稿件，而这个时候已经很难这样做了。原因在于，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另搞一套，中央传出的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可普通人并不了解内情，即使请示也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因此就发生了一个判断、把握上的问题：宣传上怎么体现中央的声音？

《半月谈》系列刊物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社办的时事

政策类的综合刊物，办刊的老同志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正确地反映中央的精神，决不能由于自己的失当而对读者产生误导。既然两种声音的真伪一时难辨，刊物又要防止传错上头的声音，使读者产生误解，怎么办呢？

回避是不行的。那个时候的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游行示威不断，聚众天安门广场等重要场所闹事的屡见不鲜，罢课、罢工和拦截铁路交通的事件时有发生，参与者喊出的口号既有诸如反对腐败一类看似正常的内容，也不乏矛头直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这么大的事情，惊动了国内外，读者急于了解真象，弄清原委，半月谈必须反映，问题是如何反映得当，不出差错。

半月谈的老读者可能还记得《半月谈》1989年的第11期和第14期杂志上刊登的共计81页、长达9万多字的《北京新闻录》。《北京新闻录》始于胡耀邦同志逝世的4月15日，止于局势趋于稳定的7月15日，把3个月中政治风波从初见端倪、演变成动乱到平息风波、稳定局势的全过程，将公开报道的材料加以汇集、整理，采取日记的形式，逐日反映事件的发生和进程，篇首加了一段话：“4月中旬以来，起于首都高校的学潮不断扩展，波及到北京各界，全国各地，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事件的发展过程，理解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稳定的决策，分析把握当前的形势，本刊资料室根据国内新闻媒介的公开报道，按时间顺序，整理出这篇北京新闻录。”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紧挨着这篇新闻录前面，还摘录了当年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和5月19日李鹏同志在首都宣布戒严时的讲话等重要文献。

今天翻阅，人们恐怕会以为这做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才懂得其中的难处。在那个事关中国命运、前途的岁月里，李锋、闵凡路和我们几个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每天都跟